

二次战后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与我国社会心理学建设

沙 莲 香

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从1908年算起，不过七十八个年头。至于我国社会心理学，三十年代曾有孙本文等学者的精心研究，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心理学的黎明时期；解放以后，它一直没有被承认过。1982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会大会，标志着中国社会心理学历史元年的开始。

我国社会心理学尚处于初建阶段，已经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也面临着不少问题。首先是如何对待国外尤其是美国和苏联的社会心理学的问题，如何在国外走过的路上建立起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基本体系，走中国的路；其次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心理特点，尤其是研究社会改革中社会心理的变化及其规律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

一、二次战后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一) 美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两次高峰

社会心理学起源于欧洲，发展在美国。社会心理学在美国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高峰年代：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而这两个年代也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盛季。美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这种经历，在客观上说明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心理学发展是和它的经济、文化发展直接相联系的，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的发展，给社会心理学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前提和研究领域。另外，二次战后美国社会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也与美国社会的民主传统有关系。

1. 三十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人际行为研究。

三十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同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一起，对小群体中的人际关系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其中主要有米德(G·Mead)等人关于小群体结构和社会化的研究，有莫雷诺(J·Moreno)等的社会病态心理的研究，还有饱格达斯(E·Bogardus)、萨尔斯顿(L·Thur Stone)等人关于社会态度测量方法的研究，等等。影响最大的是米德关于社会化的研究，后来发展为社会化理论。

社会化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从人的社会化过程、人格的形成和角色的取得过程，揭示出人适应社会环境的必由之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初期社会心理学把人视为社会环境的奴仆这种消极观点。但是，米德的社会化理论忽视了社会个体的心理机制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也忽视了社会关系的复杂性。

2. 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对社会行为的综合研究。

二次大战是现代心理学发展的转机。美国在二次大战中的心理战，为美国培训了一大批社会心理学专业队伍；同时，二次大战期间希特勒的反犹太人政策，使一批德国犹太人社

会学者和社会心理学家如勒温、弗罗姆等先后到了美国，成为美国社会心理界的一支力量。这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人才条件。

二次战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来，以计算机为骨干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由计算机理论、信息理论等构成的信息科学的出现，对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对社会行为进行综合性研究提供了科学条件。

随着美国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企业集团和整个社会的组织管理问题越来越重要。对组织管理中社会行为的多方面研究，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心理学的深入发展，在研究内容上突破了三十年代以来的小群体研究局限性。进入六十年代，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别是二次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从思考方式到行为方式的多方面变化，也要求美国社会心理学从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网中研究社会心理现象。这一些又为美国社会心理学对社会行为进行综合性研究提供了现实条件。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美国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提出的理论也多种多样。但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又相当分散，各种理论之间缺乏联系，有些“自行其事”。因此，介绍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心理的发展，有必要把各种研究归纳一下，以便找出其中的合理之处和它的不足。下面，是笔者对美国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种归纳，有两个方面：对社会行为背后的心理过程的研究和对社会行为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美国社会心理学对社会行为内部过程的研究，内容很丰富，其中主要有认知理论和态度变化理论。认知理论包括认知均衡论和认知不协调论，以及归属理论等等，都产生在五十年代末期，盛行于六十年代。认知均衡论的代表人物是海尔德(F·Helder)，他沿袭了格式塔学派关于知觉研究的立场，从认知要素的相互关系上研究认知。海尔德把认知要素简化为三个：认知主体P、他者O和认知对象X。认知主体P对认知对象X的认知，不仅取决于X，而且受他者O的影响。于是，他用P、O、X三种要素构成认知模式。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同，认知结果也就不同：三者的关系相互协调时认知均衡，比如P喜欢O，P对X的认知是肯定的，O对X也是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主体P的认知是均衡的。如果三者构成的关系不协调，认知则是不均衡的。比如，P喜欢O，P对X认知是肯定的，但是，O对X的认知是否定的，此时，P的认知出现不均衡，于是，产生心理紧张。这个时候，要么改变对朋友O的态度，要么改变对认知对象X的态度。海尔德的认知均衡论是要说明，在人的认知世界会经常出现不均衡，人们都力图避免认知不均衡而达到认知均衡的目的；而认知均衡取决于认知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要取得认知均衡，解除心理紧张，就要有协调的人际关系。

认知不协调论的提倡者是费斯廷格(L·Festinger)。认知不协调论的认知模式是由两个要素构成的：认知主体和关于认知对象的知识(信息)。当着原有的知识与所获得的知识有矛盾，比如说，认知主体原有的认知是抽烟，新有的知识是抽烟致癌，这时产生认知不协调，就是说，当新知识与原有知识X有矛盾，新知识是nOtX时，认知不协调。于是，要设法调整认知主体与新、旧知识之间的关系：要么放弃新知识，或者放弃旧知识，要么增加另外新的知识。费斯廷格的认知不协调论是从认知世界的不协调出发，论证认知不协调会产生心理紧张，为了消除心理紧张，就要设法改变认知的不协调关系。他的理论同海尔德的均衡论，几乎是同时期的，基本相同，对于六十年代以及后来的认知研究影响都很大。总之，美国社会心理学的认知研究，是把认知主体同认知客体和其他关系(其他人或其他知识)相互关联起来，从各种关系中寻找能使心理平衡的认知(知识)。至于认知研究中的其它理论，

如归属理论,调适理论,这里不再赘述。

态度变化理论,主要有说服理论和反说服理论(对说服的免疫理论)。这两种理论都是以信息传递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最早提出说服理论的是霍夫兰(C·Hovland),主要研究信息传递的可信程度(信度)对态度改变的影响。他发现,信度高低会影响态度的变化,但不是引起态度变化的全部条件,信息的内容、信息内容提示的次序、时间间隔等,都影响态度变化。霍夫兰的说服理论由五十年代的许多实验所证实,被称为态度变化研究的传统理论。六十年代以后,态度变化理论与认知理论结合,以信息处理的过程为交点,进一步研究态度变化过程中的信息处理机制。反说服理论,又称为免疫理论,就是从被说服者(受信者)如何保护自己固有的信息、目标的立场出发,积极抵御对方的说服。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从信息传递过程,尤其是从信息反馈的角度研究态度变化,保护受信者的观念自由。

从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对社会行为内在过程的多种研究中可以看出,六十年代的社会心理学弥补了三十年代社会化理论忽视心理机制的缺陷,同时又把人际关系研究同心理过程研究结合了起来,使认知研究和态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对社会行为的综合研究,还表现在对社会生活中人们社会行为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上。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有以勒温(K·Lewin)为代表的集团动力学理论,有以社会化理论为基础形成的角色理论,以社会相互作用论为基础的符号相互作用理论,有在霍曼斯(Homans)的社会交换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行为交换理论。行为交换理论以杰尔根(J·Gergen)为代表,把竞赛理论(gaem理论)、价值理论等应用于人际行为交换,形成一种最佳行为选择理论。研究如何使个人行为付出最小而所得最大,即代价最小和报酬最大。这个理论的基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易原则和利己原则。但是,这个理论所采用的方法,把行为关系矩阵化的研究,对于现代管理和决策,都是有意义的。美国在六十年代末期出版的《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动向》丛书(共八卷),第一卷就是杰尔根的《社会交换的心理学》,表明行为交换理论在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中的优先地位。

总之,社会心理学最初是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结合点上产生出来的学科,到了三十年代,又与文化人类学和统计学结合,重视人际关系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对态度变化的影响,并把统计方法引入态度测量研究;六十年代则与庞大的行为科学结合,用所有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学科去解释人类行为,带来了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新特点。

(二) 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特点

1. 多学科性。

美国社会心理学是行为科学的一个分支。行为科学的边缘性质,给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多学科研究的方法。1949年以米勒(G·Miller)为首的芝加哥大学部分学者提出,建立一个“从经验上验证人类行为的一般理论”,叫做行为科学,并把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把神经医学、生理学、遗传学、动物学等生物科学都包括在行为科学之内。后来,由于六十年代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通信理论、信息理论等物理科学和语言学、符号学、现象学等人文科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于是,上述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同新发展起来的现代物理科学、人文科学相互结合,形成信息科学,也都包容在庞大的行为科学体系中,这样,就使行为科学由五十年代的古典阶段进入现代阶段。行为科学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心理学的多学科研究,既采用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又采用自

然科学的数量方法，进入了模式化研究时期。

2. 应用性。

社会心理学是理论科学，又是应用科学。美国社会心理学明显地体现了社会心理学的应用性。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应用性，主要表现在它为社会管理和社会决策服务。

在社会管理方面，有X理论和Y理论，都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原理。X理论运用集团目标，集团计划等，进行机械性管理，Y理论则是注重工人心理需求的情感式管理。在X理论和Y理论基础上提出的Z理论，强调文化传统和国民性对组织行为的影响作用。这种管理理论，同样是建立在社会心理的基本原理上的。

还可从帕森斯行为理论的产生来看社会心理学的应用性。帕森斯的行为理论是1949—1950年与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有名的心理学者、社会学者、文化人类学者共同研究的结果。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默里(H·Murray)等人也参加了这次共同研究。帕森斯的行为理论由四个附属成份构成。即：有机行为体系论(生理学)、社会体系论(社会学)、人格体系论(心理学)、文化体系论(文化人类学)。他的社会体系论实际上就是社会控制论，直接为美国的社会管理服务。甚至可以说，帕森斯的整个行为理论，归根到底是为社会怎样控制社会行为服务的。

社会管理同社会决策分不开。后者为前者服务。美国社会心理学参予社会决策研究，是从六十年代社会指标体系研究开始的。社会指标体系中的主观指标体系，主要是社会心理指标体系。可见，社会心理指标体系的研究，对于社会预测和社会决策，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3. 经验性。

美国社会心理学十分强调经验的作用，这与它的实证方法分不开。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大体上是理论——假设——实验。

理论是由一些工具概念、概念之间的关系、概念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命题。比如，认知不协调理论，由认知、评价、态度、行为等概念，和认知出现不协调会引起认知、态度等的变化，以及认知在什么条件下不协调三方面因素构成。命题是一组因果关系体系。

假设是把理论命题作为大前提，设定一些能够满足命题要求的有关条件，以便使命题得到证实。假设的作用就在于，如何使理论命题得到经验事实的证明。

实验是对假设的验证。通过可操作性的实验，反复修正或补充理论命题，最后，用实验数据将理论数学化、模式化。实验研究有明显的优越性，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没有的方法。但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在进行实证研究、强调经验事实作用的同时，忽视了理论的作用。理论上的不足，虽然在近十年来已经引起美国社会心理学界的重视，却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4. 研究上的个人主义立足点。

所谓研究上的个人主义立足点，是指美国社会心理立论的基点是个人。社会心理现象本身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并互有影响的心理反应，离不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点，美国社会心理学并不否认，相反地，它十分重视人们的社会相互作用，也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始终把研究的立足点放在个人，以个人为中心。比如：

美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出发点，就是解决个人如何才能较好地适应复杂的资本主义竞争社会。霍曼斯社会交换理论中的快乐主义原则，虽然有人批评过，但是，整个社会交换理论是在论证资本主义竞争中的个人取胜心理和个人取胜的行为选择，唯个人取胜是图。我国社会心理学无疑要借用美国社会心理学的行为交换理

论的，尤其是借用它的具体研究方法和某些关于因果分析的结论，但它的立足点，和以个人为基点所做的有关分析、有关结论是不可取的。

美国社会心理学虽然从个人与他人的联系、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上研究社会行为。但是，这个有着种种社会联系的社会行为并不具备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的性格，相反，是以个人实现为中心的行为方式，如象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对社会需求的研究很有价值，然而，他的立论基点却是个人的欲求满足。正是他研究上的个人主义立足点，给他的理论带来了一些问题。

二、关于我国社会心理学建设的几个问题

前面说过，我国社会心理学建设首先面临着一个如何对待国外尤其是美国的社会心理学的问题。从二次战后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和它的基本特点，可以看出，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建设，应该解决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实证研究要有，但是理论无论如何不可无。理论建设的现实基础是中国的国情，因此，我国社会心理学又应该研究我国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心理问题，尤应研究社会改革中的社会心理的变化特点。

（一）关于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建设

关于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建设，我想，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是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或叫根本理论的建设，二是我国社会心理学本身的理论或叫具体理论的建设。前者属于社会心理学的根本问题；后者属于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规定问题。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规定，直接决定着社会心理学的内容体系和研究社会心理现象的立足点，等等。

从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和现状看，社会心理学急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之一是关于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包括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两个问题。人的本质问题是要解决人在本质上究竟是什么，人的发展问题是要解决人应该是怎样的即人的解放的问题。这两个方面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十分尖锐。

第一，西方社会心理学有生物主义和人性自私论的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对社会动机和人际关系的研究上。社会动机是社会心理的重要过程，美国社会心理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前面提到的马斯洛动机结构论，对于社会动机研究和社会管理，都有较大的价值。但是，即使象马斯洛的动机论，也带有浓烈的人性自私论的味道。在管理上，不论X理论，还是Y理论都贯穿了人之本性在欲求、在利害得失的观点。就连帕森斯，当他把他的行为理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以欲求为起点进行研究时，也没能避免生物主义倾向，没能摆脱掉佛洛伊德的本能欲求说的影响。至于有些人格理论，则直接把欲求作为人格基础，似乎人就是一块欲求体。国外有一本书叫《人——这个未知物》，^①用了很多实验和调查材料，对人作比较研究，从人与动物的最简单性欲比较，到现代社会生活中非人欲求的泛滥，不下十来种。参加研究的有社会心理学者、心理学者、文化人类学者、生物学者等。研究者看到了西方现代生活中存在的 unhealthy 现象，并认为“20世纪是探讨人的时代”，但是，最后的结论就象书名那样，人，是个未知物。理论界的这些情况，说明了人的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西方现实生活中，不健康的和把人降为兽的东西，在大众传播界，比比皆是。六

^① 马场淑子等编著：《人——这个未知物》，日本金刚石出版社，1972年。

十年代是西方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高峰年代，但这种发展在不少方面是畸形的，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迅速发展，带来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空前提高，另一方面，大众传播的迅速发展，又带来了社会精神生活的比较普遍的混乱，社会病和病态心理较之三十年代，有增无减。不健康的、黄色的东西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西方大众传播界有一种视听率战争，往往利润第一原则压倒了社会道义，除此之外，再就是这些不健康的东西满足一些人的心理欲求，叫心理满足。这种情况，引起了一些西方传播学者、社会学者和社会心理学者的批评，但是，都没有也无力用人的理论揭示它的反社会性。

第三，从我国的社会生活看，也有必要再次提出人的本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西方社会存在着片面夸大人的自然属性的作用，片面追求生理欲求和感官满足，那末，在我们国家很长一段时期里，尤其是“四人帮”时期，似乎相反，片面夸大了人的社会属性的作用，主张精神万能，否定人的自然的（生理的）需求；用意识形态取代社会心理，否定人们的心理生活，搞禁欲主义和清教徒生活。而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虚伪的，因为它不是生活的真实。其结果竟是，一方面，神的世界，活灵活现，另一方面，人欲世界，为非作歹。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文艺界被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文艺思潮，突出地表现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自我觉醒，人们在思索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把被剥夺了的东西，堂而正之叫回人间生活。文艺界的这些工作，不言而喻，都有助于中国人的自我认识。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新的心理需求不断增加，过去被压抑了的东西会过分地、以常态下不曾有的强度和广度表现出来。人性自私，人欲非能自控等，也不是不成问题。从这一方面看，全面展开人的本质的研究，对于我国社会心理学建设，同样是重要的。

第四，六十年代末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异常的发展，一方面，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之所在，同时，又无情地摧残了人的本质力量，不断使人异化。这种情况，引起了西方社会心理学者、社会学者、未来学者，甚至信息科学家的注目，一再提出技术与人、机器与人的关系的问题，认为有朝一日，人有被现代科学技术、被电子化了了的机器所奴役的危险。应该承认，西方学术界提出的这个有关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很值得我国社会心理学和其它学术界注意和研究，研究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变化的影响。但是，西方学术界所要求的人的发展，仅仅是个性解放，而不包括对社会的根本改造和全体人民的解放。我们研究现代科技与人的关系，是以中国的社会生活为背景，研究在中国可能发生的问题。在西方社会中发生的问题未必在中国发生，但又要创造条件避免西方已经发生的问题。

总而言之，人的问题是西方社会心理学面临的社会挑战，也是我国社会心理学建设应该很好解决的大问题。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是我国社会心理学的根本理论，是它的各种具体理论的理论基础。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的巨大影响问题，马克思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学说，进行艰苦的研究。

（二）关于研究改革中社会心理特点

研究社会改革中的社会心理特点，是我国社会心理学建设的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目前在我国所经历的各项重大社会改革，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变动。在这场社会变动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也在发生变化。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和文艺界对生活方式变化和社会

会心理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反映了这些变化与社会改革的密切关系，研究这些变化及其特点已成为社会改革不可缺少的环节。因此，研究改革中的社会心理特点，是我国社会心理学责无旁贷的社会职责。下面，拟从我国社会改革特点、生活方式变化特点和中国人民民族性格特点三个方面，说明研究改革中的社会心理的变化对于我国社会心理学建设的重要意义。

1. 我国改革的特点之一——跳跃性。

我国的社会改革是对“文革”的彻底否定，是人心所向。但是，这场社会现代化变革，与我国过去的历次运动不同，与西方社会现代化也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不同之点是，我国现代化变革一开始就受到两股力量的冲击，即伴随着对外开放，西方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和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冲击，属于外部冲击。还有伴随对内搞活，经济、政治、思想的较全面的解放所带来的冲击，这种冲击实际上是对十年动乱的不断深入地反思和批判，人民要求改革，属于内部冲击。在这两种力量的冲击下，我国的社会改革和它引起的社会变化，带有明显的跳跃性：

在经济领域，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人们的经济收入普遍增加，有些个体户还增加得很快。但是，我们经济上的生产能力不强，商品准备也不足。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还缺少物质基础。

在文化教育上，全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很低，文盲仍占有相当的比例，使人的素质的提高受到很大限制。就是说，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还缺乏文化教育基础。这个方面的准备不足，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前一种物质准备不足要严重很多，它对社会改革和社会生活的威胁也大得多。最初有的万元户进京，非住进最高级宾馆显不出威风、非吃山珍海味显不出阔气，都是落后的和狭隘的小农意识的表现，愚昧而无知。经济上富了一些，不等于精神上也有富有。知识的获得不能象流通领域中的金钱交易来得那么快。

2. 我国生活方式变化的特点之一——表层性。

广义的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行等用品的制作方式和精神产品的制作方式，都是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在生活领域的表现。狭义的生活方式是消费领域中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本文讲的生活方式是指后者。

生活方式的变化是和人们的社会需要相一致的。当着人们尚不能基本解决温饱之时，难以提出对消费品的享受，更谈不到发展。就是说，生活方式的变化是在生存问题有了保障、得到基本解决之后才能真正开始。

按照恩格斯对生活的三种分类：生存、享受和发展，我国目前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基本上是享受阶段，而且只是刚刚进入享受阶段，享受是在闲暇时间里通过对消费品的利用，调剂和改善生活内容，获得更多的生活乐趣，唤起饱满的生活热忱，增强身心健康，促进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我国目前的生活方式变化，只能说是刚刚开始，尚够不上本来意义上的享受阶段。比如，享受需要有一定的闲暇时间，我们现在的闲暇时间还不多，每周和每年的闲暇时间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少很多，因此，人们的享受，不仅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而且受闲暇时间的限制。但是，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的闲暇时间不多，而是对闲暇时间的滥用：把工作时间用于“享受”的，屡见不鲜，工作时间里聊大天、磨洋功，甚至以冷嘲热讽为乐等等。又如，在真正享受的时间里，对公共场所的破坏和践踏，不讲卫生，不讲礼貌，不讲风格，也不在少数。再如，虽然人们的服装、打扮，有很大的变化，就服装和用品的款式、

色泽,我国的商品在不少方面比国外的漂亮、典雅,我国的青年男女打扮起来不寒。然而,在西装革履的背后,在花枝招展之中,却有不少语言和习惯上的毛病,看上去很不协调。这是说,我国目前生活方式的变化,基本上是简单的享受,生活观念、价值取向,总的看是趋享受的类型。从“发展”这个生活构成看,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渐渐多起来了,但是,还不能象“享受”那样成为一种趋势。随着社会财富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生活中的“发展”的问题也会自然而然提出来。

3. 在变化着的生活方式底层——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国民性)根深蒂固,同时中国民族性格中的自我意识又比较薄弱。所谓文化是凝聚在一个民族的世代代身上和全部财富中的生活方式之总和。它包括衣食住行等用物的制作方式,待人接物、举止言谈的交际方式和风度,以及哲学、宗教、道德、法律、文学艺术、风俗、科学中的思想方法。狭义文化只包括最后这一部分。文化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逐渐内化为人们内部的东西,成为内在行为准则,最终变成习惯力量。人格是文化内化的结果,表明一个人由生物人变为社会人,并具有个人固有的心理素质和性格特点。从一个民族总体看,成员之间有共同的人格特质,成为民族性格;就是说,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大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素质和人格特点,一个民族骨子里的东西。而人格的核心成分就是自我意识,因此,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特点,很能代表民族性格。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有突出的优点。中华民族历史上涌现出那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那么多才华横溢的科学家,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人的素质是好的,费孝通教授说过“中国文化骨子里是相当美的”,是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文明之林而不败的民族因素。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又有明显的缺点。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久远性和中国社会变化的缓慢性,中国民族性格变得比较成型而又比较稳定,也有些古板,自我感受能力和自我判断能力比较低,自我意识比较薄弱。比如: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有强烈的感情性。中国社会心理过程中的感情成分十分强烈,在遇到重大的社会事件时尤其如此。“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善良的广大人民群众那样“忠诚”、“紧跟”、“豁出性命干革命”,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

不用说,中国人有着深厚的、真诚的民族感情。这个宝贵的民族感情是中华民族不曾被侵略者吞噬的心理基础,是我国人民为祖国发奋图强、是我们的国魂意识的深层纽带。但在“文革”这个非常年代里,这种真切的民族感情被复杂的激烈的政治格斗彻底煽动了,祖祖辈辈积留的纯朴感情被历史无情地捉弄了。这个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薄弱性,也证明社会心理中的感情成分不能代替其它心理过程,更不能代替社会认识。

正由于中国人自我意识和民族性格带有强烈的感情性,因此,“文革”过后,它给人们留下的最大创伤莫过于感情的伤害。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社会生活在逐渐恢复正常,人们感情生活也一样,国外社会心理学已经不太专心研究社会情感这个心理过程,我国社会心理学则应当把这方面的研究很快地开展起来。

中国人自我意识还有明显的模糊性,在人际自他关系的处理上,心态比较模糊。这可以从多年来人们对待“革命”这件事情上看得出。长期以来,人们都愿意把自己的言行解释成“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如此。不论人们的表现是怎样的,做了些什么和没有做什么,都是“革命”。在那些年代里,唯“革命”是真伪善恶的标准,“只要大方向对

头”，也就“天然合理”、“可亲可爱”了。大家都以“革命的名义”开始，最后回到“革命旗帜”下，结果，在人们相互之间除了“革命”，再也没有其它什么了；“革命”成了唯一的、最能自卫的挡箭牌。

到此，是要说明中国人自我意识和民族性格的某些特点，说明它还有不成熟的一面。而自我意识和民族性格的自我改造，不是在改造中能够迅速展开和立即生效的，它是在我国生产力发展，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认识自己和提高自己过程。在这个全民族觉醒过程中，社会心理学和其它有关学科，应当成为我国人民认识自己心灵的伟大工具。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立立

山东省首次社会学讲习研讨会 在青 岛 举 行

由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山东省社会学学会联合举办的山东省首次社会学讲习研讨会于8月1日—15日在青岛举行。来自全国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四十余人参加了学习。学员当中有厅处级、企事业领导干部，大学、党校、中专、中学教师，还有自费学习的农民。会议系统地讲授了《社会学基础理论》、《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方向与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社会学中国化问题》、《社会管理概说》、《社会学对行为科学的借鉴》等专题讲座。开设的专题讲座都是经过精心选择和研究的，因此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授课教师努力做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问题，把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工作提高到理论性上去认识，并加以理论化、系统化。通过讲习，使学员们对社会学基础理论、社会心理学、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框架有了初步了解，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学科的概念、范畴、对象、性质、特点和规律，掌握了社会学调查的一般方法。以前没有学过社会学的同志开始对社会学产生浓厚兴趣，学习后开始入门；已经学习过的和社会学函大学员认为通过这次讲习研讨，进一步加深了对学科的认识；做实际工作的同志通过学习，认为社会学对实际工作有着广泛的指导作用，纷纷表示要运用学到的社会学知识做好领导工作。

（李善峰）